

重建社会整体动员的 灾疫预防国策的伦理社会学考察

唐 代 兴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在日益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的当代灾疫面前,谋求消解灾疫之难的根治之道,就是改变过去那种单一被动的预防模式,遵循生态优先于利益、需求优先于欲求和生存优先于发展的伦理原则,以生态治理、生境重建为目标,围绕恢复地球承载力和社会自净力,重建社会整体动员的灾疫预防治理国策及其实施体系。

关键词:灾疫预防;生境伦理原则;灾疫预防治理国策;灾疫预防实施体系

中图分类号:D63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3-0032-09

灾疫(自然灾害和瘟疫——即流行性疾病)始终伴随人类文明,防治灾疫古已有之。在农业时代,瘟疫、干旱、洪水等是几种主要的灾害,其防治往往仅限于干旱和洪水,主要根据积累起来的气象经验而做出干旱、洪水到来之前的临时性治理,缺乏长治久安的预防治理。因而,古代灾疫防治对于政府而言,只是一项临时应对的工作。真正把防治灾疫纳入长治久安的治国之策,是现代的事。在我国,将预防灾疫纳入国家治理范畴,大致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这种转换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是传染性疾病的猖獗,二是洪水、干旱尤其是地震的爆发。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降,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步步滑向紧张的状态,过去那套预防灾疫的思路和模式,已经不适应新的人类生存形势。因而,在灾疫日益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的当代社会,必须反思和检讨灾疫防治的自然主义立场和由此形成的被动的等式应对模式,重建社会整体动员的主动预防治理国策。

一 重建灾疫预防治理国策所需解决的伦理问题 面对频频爆发的当代灾疫,重建社会整体动员

的主动预防治理模式,所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正确确立预防灾疫的基本伦理问题:第一,如何正确确立灾疫预防的伦理理念;第二,如何正确确立灾疫预防的伦理视野;第三,如何正确确立灾疫预防的伦理目的。

(一)灾疫预防实践的伦理理念

灾疫预防所涉及的根本伦理理念,是如何看待人,包括对人与灾疫关系的看待和对人自身的看待。

在对人与灾疫的关系的看待上,需要改变旧有观念而确立一种新理念。在过去,人们往往采取二元分离的态度来看待人与灾疫的关系,认为灾疫纯属自然,与人为无关,人力无法改变灾疫。基于这种立场,预防灾疫工作最终只落实在“防”上而无“预”之内容。“预”字,既有事先、预先之义,更有参与、干预之义。所以预防灾疫,最根本的任务不是“防”而是“预”,即在灾疫未爆发前,主动、积极地投入人力,展开人为干预,消灭一切可能发生的隐患。预防灾疫的重心不是防范隐患,而是干预从而消灭隐患。当代灾疫预防就是要彻底扬弃过去那种单一的防范

收稿日期:2010-12-3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灾疫伦理学:通向生态文明的桥梁”(09BZX058)之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唐代兴(1956—),男,四川广安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灾疫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生态理性哲学。

模式,重建一种以干预消灭灾疫隐患为主的预防模式。为此,首先必须重新认识人与灾疫的关系。在当代社会进程中,人与灾疫的关系是一种具有直接性的互动生成关系,它具体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是灾疫的生成与爆发,更多地融进了人力因素,是人力破坏自然生态的动态呈现;二是灾疫隐患的生成或消除、灾疫的爆发或抑制,都与人的作为或不作为直接相关。基于此种认识,当代灾疫预防要能收到更佳效果,必须采取积极干预对策并有所作为。

在对人自身的看待上,过去一直持守这样一种灾疫认知模式:灾疫预防是国家有关部门的工作,与个人无关,因而人们普遍缺乏灾疫预防意识和行动。形成这种与己无关的灾疫预防认知模式的最终根源,是人对自己的认知偏颇:一是对自己的个体主义认知,即只要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与我无关;二是对自己的孤立主义认知,即凡是发生在没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其实,这两种认知观念都是错误的,因为人既存在于世界之中,也生存于整体世界生变过程之中,任何个人的行为都融入整体之中,表面看来毫不关联的事情,事实上发挥着改变周围及其整个世界的功能。比如丢弃一袋垃圾、买一件电器、开车兜一次风等等,都涉及到污染排放、碳排放。污染和碳排放量的多少,不仅影响到气候的变异,而且最终成为地球环境生态是否生境化的根本性因素;而排放出来的污染和碳量的多少,最终取决于我们每个人一次又一次日常生活行为。不仅如此,污染和碳量排放的多少,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居住环境,并最终影响着我们的健康和生死存亡。因此,我们的健康或不健康、生存或是死亡,最终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行为是否具有灾疫预防意识,是否具有灾疫预防作为。所以,当代灾疫预防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孤立的自私主义认知方式,重建整体生态的人本观,重建自己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人类与地球生命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生存观,每个人都应该养成一种预防灾疫的思维品质与作为能力。

可见,当代灾疫预防应由防范为主转向干预为主,以干预的方式来进行灾疫预防就是以生态治理和生境重建的方式来预防灾疫。在灾疫已经日常生活的当代社会,在每天都与来自各方面灾疫做斗争的今天,以生态治理和生境重建的方式来预防灾疫,是一种治本的方法,更是一种迫切需要的灾疫预

防战略。

(二)灾疫预防实践的伦理视野

在过去,人们预防灾疫的视野往往是局部的、静态的;并且,人们总是把灾疫看成是自然运行的意外现象。这种静态的、局部主义的和意外现象的灾疫视野,直到今天仍然制约着灾疫预防的整体战略决策。以地质灾害预防为例,自20世纪末以来,由于地质灾害频频爆发,给人民生命财产、社会经济和环境生态带来严重损害,政府不断加强了地质灾害预防工作。这项工作主要展开为三个方面:首先,从2000年至今,政府责成国土资源部在全国1500多个县开展地质灾害调查区划,对存在的地质灾害隐患展开监测,这项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但目前还有待于继续向深度方面加强和向广度方面拓展;其次,在全国范围内构建“群测群防”机制,组织当地群众进行监测,一旦发现险情及时报警,提示公众及时避让、疏散;其三,借鉴20世纪60年代经验,继续推广“群专结合”即专家与群众联合预防模式。

客观地看,我国今天的地质灾害预防体系经由此三方面的努力,已经得到了初步建立,但是这种预防体系仍然限于局部主义、静态主义和意外现象论视野。比如地震,如果按过去的观念视野来看,不过是地质结构变迁的体现,它与人为没有关系,也是人力无法解决的,甚至预防都无能为力,因而诸如汶川、玉树地震的爆发,属完全纯粹的天灾。但是,如果不拘泥于这种静态的、意外事件的和局部主义的视野,就会发现今天的地震恰恰是整个地球和宇宙运动失律的体现,并且地球和宇宙运动失律更多的是由人力造成的。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的爆发,确实由地质结构所决定;但同时也随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发生变异,而且地震爆发的频率、强度、裂度以及对人类造成的伤害和破坏程度,与人类行为有直接关联。因为地球与宇宙、地球与地球生物、地球与人类之间本身就构成动态生成关系,地球的运行影响地球生物和人类生存,人类作为同样影响地球运行,并潜在地改变着地球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方向。2010年5月,地质专家殷跃平就“玉树恢复重建与防灾减灾”问题接受国土资源部网站采访时指出:“‘Y字形’构造带上是长江上游支流、澜沧江、怒江河流发育分布区,散落着玉树、康定、西昌、都江堰等地级城市以及数十个县城和数百个集镇,兴建了数百座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如果忽视构造带上的区域稳定

性评价,继续大规模扩建,可能在地震来袭时被高速远程滑坡和堰塞湖摧毁。汶川8级特大地震向我们敲响了巨大灾难的警钟,绝不要重蹈覆辙。玉树7·1级地震又再次告诫我们,必须认真防范强烈地震区的构造活动与地质灾害问题。”^[1]

由此不难看出,在灾疫频频爆发的当代社会,为了避免更多的灾难发生,灾疫预防必须具备一种整体视野。这种整体视野要求,灾疫预防应该是国家范围内全区域的。仅以地质灾害而论,哪怕是今天没有地质灾害隐患的区域,也要进行预防,因为地质结构是一个整体,比如西部地质结构的变动,同样会影响到东部地质结构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地球和宇宙运行不已,人类活动拓展不息,并且近代以来的人类活动事实上对地球运行和地质结构产生着潜在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旦累积叠加至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出裂变现象来。不仅如此,灾疫预防更应该是全球视野的。气候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客观地看,今天的极端气候形成,是人类共同作为造成的。如果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今天的极端气候,同样需要全球的努力。否则,气候就会更加恶劣,人类生境亦将更加恶化。

当代灾疫预防还应该具有生态视野。生态视野的核心就是动态生成性。客观论之,一种灾疫既可能生成爆发,也可以动态消解;即便是不可避免的灾疫,其爆发所产生的危害或灾难,有可能达到最大化,也有可能实现最小化。这取决于人的作为,而且首先取决于人如何看待灾疫,怎样进行灾疫预防。这里的“人为”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个人的作为或不作为,如果具有整体生态视野,个人或者群体在日常生活行为中具有灾疫预防作为,那么灾疫就可以得到减少,哪怕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也会把灾难降到最低程度;二是政府的作为或不作为,比如温室气体的降低,需要从减排入手,这是一项全球事业,既是发达国家的事,亦是发展中国家的事。

(三)灾疫预防实践的伦理目的

基于如上伦理理念和生境视野,当代灾疫预防的根本目的是进行生态治理,实现生境重建。因为近代以来的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到今天,已经使整个地球环境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自然、生命、人、社会之间共生互生链条出现了裂痕,并且自然、生命、人、社会之间的生境功能有所丧失,全球气候失律、灾疫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就是体现。在这

种生存处境下,灾疫预防必须立足全球、立足整体,着眼于动态生成,从根本入手进行生境重建。

所谓从根本入手,就是从重建自然、生命、人、社会共生互生链条方面下功夫,从全面恢复地球生境和社会生境的基础处用力。仅前者论,功夫应该下在根本上改变温室气候,因而灾疫预防的重心是通过社会整体动员,展开低污染或零污染、低碳排放或零碳排放社会运动,使低污染和低碳排放社会化、人人化、日常生活化。就后者论,恢复地球生境,需要重新制定发展国策,构建可持续生存式发展战略。以此战略为导向,国家应有步骤地弱化以石化能源为动力、以地下资源和地表资源为依托的经济模式,开辟创建以太阳光能、风能、生物能为主的可持续再生能源体系和可持续再生资源体系,进行全面立法和严格司法,使森林、草原、土地、江河、湿地休养生息,禁伐、禁牧、禁开采、禁修水电工程;恢复社会生境,以可持续生存式发展为社会导向,放弃唯经济增长模式,废除消费主义鼓动政策,构建新的法规,重建节约型社会,引导社会构建简朴生活方式;重建社会发展的整体格局和发展战略,即中止大中城市的规模发展,推进大中城市功能发展战略,全面推进小城市和城镇建设,以小城市和城镇发展带动农村,并推进农村生态农业产业化和生态工业农业化。如上目标落实在人身上,主要呈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人人预防灾疫而实现人人安全生存;二是促进人人成为生境伦理者,人人参与预防,人人为消除灾疫隐患、实现安全生存而从当下做起、从身边事做起。

二 重建灾疫预防治理国策所需遵循的生境伦理原则

以生态治理、生境重建为根本目标,当代灾疫预防必须获得生境伦理支撑。生境伦理是以“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为根本法则,以自然、生命、人、社会共生互生为价值导向,以实现生态文明为最终目标的伦理形态。生境伦理将为灾疫预防提供三大伦理原则,即需求优先于当代人的欲求原则、生态优先于利益原则和生存优先于发展原则。

(一)生态优先于利益

灾疫预防始终要围绕利益来考量。在过去,灾疫预防以尽可能减少灾疫损害为目标,实际上是围绕人的利益和局部利益来考量,很少考虑过生态利益。当代灾疫预防要实现生态治理和生境重建,必须遵循生态利益原则。

生态利益原则就是普遍利益原则。“普遍利益”是指自然、生命、人、社会四者共在互存、共生互生之利益。因而普遍利益原则既是整体利益原则,也是平等利益原则和生生利益原则。整体利益原则揭示自然、生命、人、社会四者之间的利益是整体的,考虑任何一方利益,都必然牵动其他方面的利益损益问题,因而灾疫预防必须从这四者整体出发来考量。平等利益原则要求人、国家、人类对利益的谋求,必须在与自然、地球、生物世界平等的平台上展开,否则就会造成后者残损,灾疫预防就难以收到真正的成效。生生利益原则要求灾疫预防必须围绕一个“生”字而展开,即既生己利,也生他利。有效的灾疫预防,就是全生利益,即既使人、社会、人类获得生生,更使自然、地球生命得以生生。

生生是普遍利益原则的伦理本质。基于这一伦理本质规定,普遍利益原则达向实践的价值诉求,就是生态利益优先于物质利益。一般而言,对任何生命和人来讲,利益都是至关重要的,但从根本上讲,生态比利益更重要。因为人作为世界性存在者,与这个世界上所有生命形式一样,只能诞生于群体,存在于群体并生活于群体之中——人始终离不开社会整体、地球整体和宇宙整体。人的生命存在及其生存展开的整体性,决定了人的每一个意念或想望、每一个生存行动都是动态的和相互关联的,一个人的欲望与行动把其他与此直接关联或间接关联的人、事、物及其过去和未来等等都联结起来,构成一个使其行动得以展开的动态整体的环境。这个整体环境如果充满扩张力,那就是此人的行动得以顺利展开的生境,如果这个整体环境体现出内敛,那此人的行动就陷于困境^[2]。

利益始终是人的生存行动的内动力,但利益毕竟是人的生存行动展开的最后结果。行动展开能否达到最后结果,行动展开所达到的最后结果能够形成什么样的利益事实,往往不是由行动本身来决定,而是由行动关联的各种因素所形成的合力——环境生态所决定。客观地看,在人类社会生存发展进程中,关注利益,首先需要关注生态;追求利益的最优化,首先需要营造能够创造最优化利益的最优环境生态。所以,在当代灾疫预防中,对地球生态和社会生态的整体考虑,始终应该优先于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反过来看,对环境生态的优先考虑,这就是个人、社会、人类对利益的最大实现^[2]。

(二)需求优先于欲求

生态利益的核心原则,就是平等原则。根据平等原则,生命应该平等,地球环境和社会环境应该在平等的平台上展开。平等原则还揭示了需求的普遍性、一般性和欲求的特殊性、个别性。因此,无论是自然世界,还是人类社会,欲求一旦膨胀,需求就会遭受压制或剥夺;欲求一旦由特殊、个别而变成普遍和一般的内容,需求就会被完全扭曲,强权就会盛行,人类就会以征服、改造自然和掠夺、蹂躏地球为荣,现时的自我享乐与高耗费就会以剥夺后代的最低生存条件为代价。当代人类频频遭受的灾疫之难,就是人类欲求全面膨胀,最终导致整个地球生态和社会生态达向无序的整体呈现。在地球生态和社会生态处于整体无序状况下,灾疫预防必须遵循需求优先于欲求原则。

以需求优先于欲求为灾疫预防的伦理原则,首先需要在灾疫预防中确立起地球和生命世界的需求优先于人类欲求的伦理原则。因为宇宙中只有一个地球,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生存在地球上。地球生物圈给我们提供了存在和生存的全部条件,并且为我们的存在和生存创造了全部的可能性。我们的存在和生存必须依赖于它们,以它们为母体、为土壤、为生存的来源。因而,它们的需求构成了人类最根本、最不可缺少的需求,人类根本不应该为了自己特殊的欲求而剥夺地球和生命世界的需求。当代人类所承受的已经日常化和全球化的灾疫之难,是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苦果,是自然对人类欲求无度的惩罚。为了改变这种备受灾疫惩罚的状况,我们必须学会从自我欲求征服地球和生命世界的行动模式中走出来,重建地球和生命世界的需求优先于人类欲求的行动模式。唯有如此,灾疫预防实现生态治理、恢复生境,才真正有希望。

遵循需求优先于欲求的伦理原则,还必须建立起后代的需求优先于当代人欲求的原则。后代关怀主义经济学家庇古指出,低估后代需求从而使供应不足,是人性中含有的一个偏私成分。“即使在不同的时候,我们要求得到相当的满足的愿望是相同的,可是我们对未来满足的愿望没有对现在满足的愿望强烈,因为很可能未来愿望的满足不是我们自己的。……愿望和满足之间的差异,对经济福利实际的损害方式是:节制新资本的创造力”^{[3]179}。工业社会、现代化建设,都是以欲求为动力,并以鼓动、扩张欲

求为生产的基本战略。在这种战略引导下,人们自然而然地注目于当前现实,由此无节制地运用资源来服务于现在的生活,较少甚至根本忽视为未来和后代储存资源考虑。因为在现在与未来、自己与后代之间的考量上,人们往往抛弃理性节制,依据自私冲动,进行以当下利害得失为准则的实利计算。这种以当下利害得失为准则的实利计算方法,往往驱使人们以破坏未来为手段来谋取现实利益,并且更多时候是只讲目的不讲手段,或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人们将获得远不止他们自己所需要的利益。因为掩盖和放弃那些不能开采的、但是还有价值的煤层的结果是,最优煤层遭到急功近利的开发;无视繁殖季节进行渔业生产,因而给某些鱼种带来了面临灭绝的威胁;农业生产活动也是如此,足以使土壤肥力耗尽;这些是与本论题相关的各种例证。由于微不足道的用途,用光现在富足而将来可能稀缺、不易得到,甚至对后代有更重要用途的自然产品,尽管这代人比它所获得的破坏掉的实有资源更多,从损害总的经济满意度上说,也是浪费。为了将旅程时间从已经很短的状况缩短到更小的程度,数量巨大的煤炭被用于高速运输工具。或许我们正以我们的后代永不能飞到纽约为代价,才削减了我们到纽约的飞行时间”^{[3]96}。

(三)需求是必须,欲求是浪费

遵循需求优先于欲求的伦理原则,强调人类与地球以及地球生命之间的平等生存,更应该强调杜绝浪费,厉行生存节约。

灾疫预防要实现其生态治理和生境重建,还要遵循人人平等的需求优先于个别人、个别利益集团、个别阶层欲求的原则,更要遵循人类的平等需求优先于任何个人的欲求的伦理原则。因为按照人人平等和生命平等的伦理诉求,需求永远优先于欲求。

需求优先于欲求,构成了当代社会人人生存平等的首要伦理准则,亦成为当代灾疫预防的首要伦理判据,因为需求优先于欲求之伦理准则揭示了人乃资源需求者这一存在事实。仅从物质资源配享角度来看,应对生命存在对资源的需求观,需建立起物质基础主义生存论;应对生命存在对资源的欲求观,则建立起物质至上主义生存论。

物质基础主义生存论是一种健康的生存观,它适当地强调生命存在的先决条件性,强调物质资源对生命存在的基础性。它在伦理道德上认可合理的

物欲,它始终承认人类价值观的确立既不能无视人类的苦难,也不能无视生命世界的苦难。所以物质基础主义生存论既形成一种制度社会的价值导向,“没有丑陋的城市而得到工业,没有道德败坏的投机而提高食品生产,没有文化异化而发展教育,都是可能的”^{[4]245},也形成一种自然社会的价值导向,在生命世界里,存在者没有贵贱,生命没有优劣,尊重任何生命的存在权利,让每种生命按照自然的法则以自身方式实现自我存在的需求满足,这是最基本的生命伦理原则,也是最高的生命道德。

与此相反,以欲求满足为动力的物质至上主义生存论,恰恰是一种剥夺人性的生存观。它把人类驱赶上操作者的道路,“做人”就是为了“占有”,并且以“值钱”来取代“价值”。这种物质至上主义生存论把人变成拥有或操纵的对象,把人的存在降低为人的拥有,以对象物的价值来取代人的价值,即是否值得,要以货币来衡量,以权力、地位、身份来衡量。这种物质至上主义生存论鼓动人们无批判地追求物质财富,使有限的物主宰无限的人,使各种无限度的欲望最终导致有限度的人的瘫痪,因为物质至上主义生存论往往引导社会把高生活水准和高效率描述为绝对的进步方式。在物质至上主义生存论的诱导与鼓动下,人们往往热衷于以欲求为动力。在物质至上主义生存论主宰的社会里,往往一个领域的进步和发展需要某个领域或更多领域的贫困与落后为代价,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繁荣或发展往往会以更多的地区或国家承受更多的贫困和苦难为前提。物质至上主义生存论所支配的时代与社会,其制度不关心道德,甚至反道德;其政治和经济所追求的不是平等生态利益,也不是权利对权力的限度,而是权力对权利的剥夺,强权对利益的瓜分与占有。在物质至上主义生存论推动下,所创建起来的文化是等级主义的剥夺人性的“贫困文化”。这种剥夺主义的贫困文化,就是“富人是贪婪的,欲求超过其需求;而这种贪婪正在快速地扩展到穷人中去。一个贪婪的世界只能是分裂的世界,伦理道德堕落,走向野蛮主义”^{[5]3}。这种野蛮主义,最终指向整个自然世界和生命世界。因而,物质至上主义生存论导致了双重的剥夺:对人的平等生命权的剥夺和对地球的平等生命权的剥夺。这种剥夺达到普遍状态时,就是人类生存走向绝境而沦于毁灭之时。当代社会的全部生态危机,正把人类推向陷于死境的临界状态。面

对这一临界点而实施社会整体动员的灾疫预防战略,必须杜绝突破界限的各种可能性,真正确立“需求优先于欲求”的伦理准则。

(四)生存优先于发展

灾疫预防与发展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那种以预防灾疫来促进经济发展的说法或做法,虽然从“发展就是硬道理”这个角度来讲没有错,但对于灾疫预防来讲却是指错了方向。因为灾疫预防所面对的,是存在秩序遭受严重破坏、生态安全遭到严重威胁的现状,它所努力解决的是生态治理和生境重建。生态治理和生境重建涉及自然秩序、地球生物圈秩序和人类社会秩序的重建问题,而秩序重建不属于发展范畴,只属于生存范畴。灾疫预防直接服务于生存,它并不与发展直接相关。所以,灾疫预防必须遵循生存优先于发展的伦理原则。

生存优先于发展原则蕴含了一个生存法则:即生存才是根本。没有生存,不可能有发展;没有坚实的生存基础,不可能有持久的发展后劲;当生存出现了问题,产生了断裂,丧失了基础,去盲目谋求发展,哪怕一时得逞,也最终要失败。当代出现的全球性灾疫是工业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片面追求发展所造成生存基础丧失的体现,因而全力关注生存、谋求生存秩序的恢复和重建才是灾疫预防的根本任务。

生存优先于发展原则要求当代灾疫预防的展开与实施必须同时兼顾两个维度,即自然维度和社会维度,并且应该首先考虑自然世界生存秩序的恢复与重建,唯有如此,社会生存秩序的恢复和重建才可能成为现实。因为,只有当自然世界恢复了生存秩序,灾疫才会逐渐消解,并且只有使自然世界恢复正常运行,人类社会才可能最终获得秩序。

三 确立重建当代灾疫预防国策的重心问题

在当代社会进程中,要做到有效避免灾疫的发生,尽可能消除灾疫隐患,其核心任务是引导社会在更广泛意义上考量地球承载力和社会自净力。考量地球承载力和社会自净力,是为了构建起地球承载体系和社会自净体系。而这两个体系得以构建的内在支撑,恰恰是伦理。这种伦理最终体现为一种限度认知,一种尊重品质,一种自我节制精神和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考量,构建起地球承载体系和社会自净体系,最终实现对人类实践理性力量的重建。

(一)考量承载能力,重建承载体系

地球承载能力主要呈现为两方面,一是地质结构承载力,二是地球表面承载力,因而考量地球承载力、重建地球承载体系,应从地质结构承载力和地球表面承载力的重建入手。

在工业文明社会,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之所以不断推进自然生态环境的死境化进程,就在于人类始终在无序和无限地开采地下资源。比如各种地下矿产、石油、天然气、地下水的超量开采和抽取,使地球的区域性地质结构发生畸变,最终必然导致各种地质灾害的频频爆发。因而,重建自然环境生境化,必须首先考量地质结构的承载力,有序、有限度地开发,或中止地下矿产、石油、天然气、地下水的开采和抽取,重新恢复地质结构的承载力。

灾疫预防考量地质结构承载力,实质上是对全国范围内的地质结构逐一进行区域性调查,尤其是对每一区域的地壳、地体、山体的稳定性以及断裂活动性展开深入而系统的调查、探测、研究,对每个区域的地质结构能力和承载容量进行严谨而科学的评估,由此建立起国家地质结构承载力指南,构建起全国范围内区域性地质灾疫预防体系。

地球表面承载力主要是指一旦逾越了这个限度,突破了这种容量的极限,它同样会因此而丧失稳定性和安全性。在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地球表面承载力既指山脉、江河、草原、森林、湿地、荒野、耕地等等的自身承载限度和最大容量范围,更指城市能力和农村能力,即城市和农村的容量、城市和农村的承载力。因为今天的城市和农村已经成为新的灾疫生成爆发之源,许多的灾疫之难都因为城市的超容量发展和城市向农村的污染所引起。比如,城市超容量,成为巨大无形的污染源,通过空气、江河流、雨水、空气等等而流向农村,使农村成为污染和疾病传播的集散地。因此,灾疫预防必须考量地表结构,对全国范围内的区域性地球表面结构、承纳容量、承载能力等等进行系统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科学而严谨的国家地球表面承载力指南,构建起全国范围内地球表面灾疫预防体系。

(二)考量自净能力,重建自净体系

以生态治理、生境重建为目标的灾疫预防,就是要建立两个体系:一是地球承载体系,一是社会自净体系。前一个体系有助于引导人们理性地重新认识地球、认识自然,重新调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存在关系,重新调整人类的行为,使人类的活动在地球承载

能力范围内展开,这是消除灾疫隐患、避免灾疫发生的根本战略。构建后一个体系,是引导人们理性地重新认识国家社会,重新认识自己赖以生存的公共平台,调整人与社会之间的生存关系,重新调整人的行为,使人类自己的活动在社会自净能力范围内展开,这是消除灾疫隐患、避免灾疫发生的重要战略。

所谓社会自净能力,是指社会对污染的自我净化能力。在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污染早已超过了自然自净化能力而不堪重负,它需要社会自净化。社会对污染的自净化,是指社会按照卫生、健康的要求而对人类制造的污染予以有序的净化,使之达到无害程度。社会自净能力就是指这样一种人类能力。

污染之于当代社会,普遍而种类繁多,其中最大的污染源:一是生产,尤其是石化能源的生产、有毒化学产品的生产;二是消费,尤其是高碳产品的消费。除此之外,在当代社会,推动污染社会化的另外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地球表面承载力的下降,造成了自然净化能力弱化;二是人口的无序增长,维持生命的物质如空气、水和土壤等自然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被污染,“人口数量在以指数形式增长……随之而来的是自然资源持续的衰退和损耗。在世界范围内,困扰后代的有毒废弃物会继续累积。世界荒野区在被开发,森林被砍伐,湿地在干涸,山林被烧毁,草地被过度放牧,它们就要消失殆尽。随着臭氧层的破坏和潜在的温室效应的加剧,人类行为正威胁着大气和星球本身的季节”^[6]。

污染带来的危害众多,但最普遍最重要者有二:首先是引发自然灾害,其次是导致各种疾病。流行病学的调查数据表明:特定的污染,特别是有毒废物带来的危害,会侵犯生命权。1992年,世界人权大会宣布,倾倒有毒和危险的物质和废物,对人的生命权和每一个人的健康造成了潜在的威胁。1998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宣布:从人道主义和环境的角度来看,倾倒有毒废物是对人类生命权的侵犯。美国人权委员会则宣布,水是生命之源,免于有毒污染的水是组成生命的一部分。在印度,法律规定生命权包括了生命在健康的环境、免于污染的环境和生态平衡得到保护的条件下存在的权利。印度最高法院还进一步规定,每一个公民都有使用没有受到污染的水和空气的权利。巴西法院也规定,因为保护环境的质量对于实现人权来说是很基本的,对环境的

法律保护也是生命权的一种实现。

抑制、降低、消除污染对自然和人类的危害,必须提升社会自净能力。提升社会自净能力,首先是对社会污染状况、污染源、污染渠道、污染方式等进行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研究,构建起以人的生命权保护、卫生、健康为目标的社会自净能力指南;在此“指南”的规范下,构建社会对污染的容量范围,建立社会公共卫生标准体系和公民身心健康评价体系;再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恢复社会自净力实施体系。

构建社会自净力实施体系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城市,二是农村,即建立城市社会自净实施体系和农村社会自净实施体系。相对地讲,对前者的建设更迫切。因为在今天,许多的农村问题都变成了城市问题,许多的城市问题最终又成为了农村问题。前者如农业人口的城市化,巨大的城市自净容量如何保持就成为问题,它涉及到城市自净能力如何有效构建与实施展开。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的数据,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7.92%增加到44.94%^[7]。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导致城镇住房、交通以及其他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增加,能源资源消费也迅速增长,由此使得城市成为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城市的污染以及由此生成的各种流行性疾病,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自净,最终通过大气、雨水、江河流水和流动的人口而流向农村,使农村社会自净力不堪重负。所以,首先应该构建城市社会自净实施体系,并以此促进农村社会自净实施体系的全面构建。

四 构建当代灾疫预防全民实践的宏观方法

(一)消除无理性实力,填平欲求鸿沟

消除无理性实力,填平欲求鸿沟,这是当代灾疫预防全民实践的的认知方法。

从根本上讲,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追求的是无理性实力。无理性实力既是一种姿态、态度,也是一种价值观,更是一种行动方法和行动原则。这种行动方法和行动原则可简要地表述为:只讲目的不讲手段、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在当代社会进程中,频频爆发的灾疫之难背后的人力因素,均源于近代以来人类对这种无理性实力的盲目崇尚。

人类无理性实力最集中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无理性经济实力,不论经济学家们所鼓吹的市场经济,还是国家社会对自然世界进行掠夺式的资源开发战略,都体现了这种无理性实力的张扬;二

是无理性政治实力,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冷战,把人类生存的最终矛盾归结为政治信仰、制度、主义之战,同样体现了无理性政治实力的无节制性;三是无理性军事实力,诸如军备竞赛、争相研制核武器、核反应堆以及向太空开发等等,更是体现了这种无理性实力;四是无理性科学技术实力,发展科学技术并把它置于社会原动力的地位,同样是追求无理性实力的一种表现形态。

无理性实力观的产生和社会化泛滥,归根结底是人类对自我欲求片面张扬的结果。因为张扬欲求,往往是以压抑、消解需求为代价。因而,人类欲求越旺盛,世界需求就越弱化;世界需求越弱化,就越丧失对社会的原动力功能。

历史地看,人类的无理性实力一旦超越了世界需求和人类本身需求的限度,必然导致自然、生命、人、社会四者共在互存、共生互生之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因为无理性实力追逐私利,包括国家私利、集团私利、阶级私利、政党私利、企业私利、家庭私利等,为了实现私利或更大程度地谋取到私利,其行为可以毫无顾忌地指向对公共化的生态系统的破坏,这就形成了如加勒特·哈丁所述的“公地的悲剧”。当代频频爆发的全球性和日常生活化的灾疫之难,其实就是这种“公地的悲剧”的一种表现形态。中止这种悲剧的根本方法,就是构建一种社会督导体系和激励机制,用普遍利益权利的需求去填充人人心中那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欲望鸿沟,从根本上消除人的无理性实力观、价值观、行动方法和行动原则,重建一种生境生态观。

(二)构建生态治理和生境重建社会预防体系

根据灾疫预防的整体目标要求,围绕“生态治理、生境重建”来构建开放性的社会化预防体系,应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首先,创建全民参与的社会化灾疫预防体系。在当代社会进程中,灾疫预防既是政府的事,更是国家共同体每个阶层、各个领域、所有群体和每个公民的事。因而,必须迅速改变过去那种预防灾疫仅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事的认知模式和观念,构建起预防灾疫人人有责的伦理认知体系和人人问责的行动体系。要构建起人人有责的灾疫预防伦理认知体系,必须尊重每个公民,充分释放每个公民的公民权,使每个公民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防灾工作不仅仅属于市政府内的‘防灾对策办公室’,行政各

部门都息息相关。各部局都应该从保护市民的生命和健康,不破坏自然,充实居住福利,尊重从儿童到老人的个性与人权等方面出发来展开行政工作,这样做才能真正搞好防灾。平时行政就不重视市民人权的话,地震受灾时也不可能保护好市民的生命”^{[8]33}。要构建人人问责的灾疫预防行动体系,必须充分发挥每个社会机构、每个公民的潜力、创造力、社会关怀力,构建各种激励机制,鼓励每个社会机构、每个公民积极参与到灾疫预防的策划、组织、管理、实施行动中去,献计献策、献智献力。

其次,改变灾疫预防只由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来承担的工作观念和管理模式,建立起灾疫预防的社会化运作机构和社会化运作模式。政府应该创造条件,把灾疫预防工作交给社会机构来实施,政府多为其提供服务、保障并进行有效督察。

其三,建立全民化的灾疫预防基金。基金的筹集注入采取政府、企业、公民、慈善家四者结合的方式,即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按其当年GDP比例投入,全社会每个人每年均以其收入的部分所得注入灾疫预防基金,比如农村人口每人每年可交纳灾疫预防基金1.00—5.00元人民币;城市人口每人每年可交纳灾疫预防基金3.00—8.00人民币。以这种方式唤醒人们的灾疫预防意识,增强人们的灾疫预防精神和能力,以体现灾疫预防人人有责,更体现灾疫防治关涉到人人的生存安危和生命健康。

(三)创建灾疫预防生境成本管理制度体系

当代灾疫预防就是积极展开生态治理,恢复或重建地球生境和社会生境。实现这一目标任务,应以政府为主导力量。首先,政府应根据当代灾疫特点和对灾疫预防的整体要求,制定出切实可行和行之高效的灾疫预防体系;二是政府应根据所制定的灾疫预防实施体系的整体要求,创建完善而灵动的灾疫预防管理制度体系。

创建灾疫预防管理制度体系的首要任务,是创建健全、高效的生境化成本管理制度。灾疫预防管理必须成本化,即灾疫预防投入多少,应按其预算要求产生多少灾疫预防收益,这个收益不是指实际的经济收益,而是指生态收益,包括地球生态收益和社会生态收益。衡量这个收益的宏观指标,就是地球和社会的生境化程度。因此,灾疫预防生境化成本管理的实质,就是以生境重建程度为灾疫预防管理的根本要求和具体评价指标。为此,必须构建起灾

疫预防生境化成本预算体系,确立灾疫预防生境化成本管理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灾疫预防生境化成本管理督察制度和评价机制。

创建灾疫预防管理制度体系的基本任务,是构建灾疫预防生境成本的危机管理体制。危机管理(Crisis Management)亦即危机沟通管理(Crisis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它意在加强信息的披露与公众的沟通,争取公众的谅解与支持。灾疫预防之所以要构建危机管理体制、实施危机管理,首先在于当代灾疫预防既是一种整体性预防,更是一种治理性预防或者说是生境重建型预防,这种预防需要积极、主动、创造性,当然更讲成本和效率,实施

灾疫预防的危机管理,恰恰符合当代灾疫预防的特征和整体要求。其次,因为危机管理接受四大行动原则规范并体现四个方面的特征,即:明确的时间要求,以及由此形成的时间性原则;单位时间内的最大效率化,以及由此形成的效率原则;开放性和跨领域、行业的高度协作要求,以及由此形成的协同原则;探求最小成本付出的最大生境重建效益规律,以及由此形成的科学原则。正是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当代灾疫预防的最佳管理方式,就是危机管理方式。唯有通过这种危机管理方式的实践探索,灾疫预防生境化成本管理制度体系才可能真正得以建立。

参考文献:

- [1]殷跃平. 玉树恢复重建与防灾减灾的思索[J]. 国土部网站, 2010-05-05.
- [2]唐代兴. 发展与协调平等视域中的生境伦理构建(下)[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9, (2).
- [3](英)E·库拉. 环境经济学思想史[M]. 谢扬举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4](美)德尼·古莱. 发展伦理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5]罗康隆. 发展与代价:中国少数民族发展问题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6.
- [6](美)戴斯·贾丁斯. 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M]. 林官明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2008[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
- [8](日)早川和男. 居住福利论:居住环境在社会福利和人类幸福中的意义[M]. 李桓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An Ethical Sociological Exploration of the National Policy of Reconstruction and Overall Mobilization in Preventing Catastrophes and Epidemics

TANG Dai-xing

(Chines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Confronting the contemporary calamities and pestilences (CP) which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globalized and part of daily life, the way to radically cure the tragedy of CP is to alter the past individualized passive prevention pattern, and follow the ethical principles of ecology before benefits, needs before desires, and survival before development, to take the eco-governance and habitat reconstruction as the objectives, to restore the bearing capability of the earth and the self-purification capability of the society, thus to reconstruct the national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 system of general mobilization in controlling calamities and pestilences.

Key words: prevention of calamities and pestilences; principle of habitat ethics; national policy of calamities and pestilences control; implement system of calamities and pestilences prevention

[责任编辑:凌兴珍]